



“东北时光” 忆陈云

人物小传

陈云(1905.06.13—1995.04.10),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青浦区)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参与了不同历史时期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在东北期间,任东北局副局长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指挥参与临江战役。随后担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领导“银元之战”。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负责全国经济恢复工作与制定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随后连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

本报记者 江雷

作家李藕堂历时10年的纪实文学作品《陈云在东北》中写了这样一个小故事:陈云问金国清:“当某人被锦衣卫杀手追杀到钱塘江边时,在面对后有追杀、前有波涛汹涌的大江时,他还有生路吗?”

唱着抗战胜利的歌,走向东北新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中共中央作出重要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只要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陈云非常清楚这个决策的目的,他从此走上了东北“新战场”。

正如一位在东北几个大城市金融战线辗转工作40多年的88岁老干部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讲述的那样:当年鉴于东北在军事、政治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中央从关内各解放区调入2万多名干部、10万多名军人,派遣大批干部到东北开辟新战场。

资料显示: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共77名中有21名在东北,中央政治局委员13名中在东北工作的有4名。

1945年的秋天,当哈尔滨“中共北满分局”以最温暖的情感让东北百姓感受到生活、生命意义时,很多老东北人记得,那位被叫做“书记”和“(北满军区)政委”的人的名字叫陈云。

1945年11月,陈云在哈尔滨北满分局召集高岗、张闻天,起草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资料显示:这份打给东北局并转中央的电报是1945年11月30日发出的。中央迅速复电表示“完全同意”。翘首以待的人们也包括今年82岁、新中国

成立后从事35年物价工作的市人大代表张女士。“那时,我才12岁。18岁的哥哥已经在沈阳读书。”张女士说。

事实上,从1945年10月开始到1946年7月,陈云等人用8个月时间完成了“北满五省减租、减息运动”。后总结为“中国历史上经济复苏、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奠基时期”。

1946年4月20日,陈云再为北满分局起草了《北满根据地建设的进展状况》,详细地解说了北满五省“农民斗争目前是清算运动,同时分配开拓地、满拓地、汉奸地、减租增资”的事实。

130万吨粮食,换来东北根据地的巩固

1946年5月,是东北很多老干部最难忘的青春岁月:北满分局在哈尔滨召开了省委书记联席会议后,“土地改革”正式开始。土改,是他们政治生涯的开始,也是他们认识共产党高级官员陈云的开端。

“那时的粮食,就是弹药。”这也是2015年9月时,几位老东北抗联战士可以自豪的回忆。

为了那“130万吨粮食就是130万发炮弹”的目标,整个夏天,东北局委托陈云同志做调查,起草了“七七决议”。会前,陈云亲自与东、西、

南、北满的领导们分别谈话,倾听大家对形势、任务和建设根据地的看法,并亲笔写了“文件草稿”,并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后再作了修改后“上报中央”。

艰难的岁月,依然考验着从延安走出来的领导干部的意志、情感和信念。当时,部分共产党员已经出现了后来“电视剧”中的镜头:图安逸、恋大城市、喜汽车,丢掉农民衣,穿皮鞋的。而陈云强调,“国家还需要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不讲条件去下乡的干部”。

陈云接管沈阳,对铁路建设情深意长

1948年10月,随着锦州解放,陈云担任了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12月29日,在从哈尔滨前往沈阳的专列火车上,陈云主持召开了“军管会第一次会议”。并未感到一丝轻松的他认真作着指示:沈阳是东北最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把沈阳接管好,使巨大的生产力不受破坏,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可以有力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可以为接管关内各大城市提供经验,对建设东北和支援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会后,列车转移到铁岭市。陈云写了《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简报》,电告东北局并转报中央:“工厂和企业迅速复工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解决职工生活问题的最好办法,恢复生产越快,工厂保护会越好,职工生活问题就越容易解决,社会治安也会越好。”

当时,每天有96列客货车进出沈阳。

为了安定民心,宣传党的政策,陈云安排发行了入城前就印好的第一张报纸。他表示:“目的是为了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具有政治经验的陈云

认为:接管沈阳有一条重要教训要汲取,即入城后不要立即将所有监狱犯人释放。因为,在战争及政权转变过程中,保护巨大的生产力,迅速恢复并发展了生产头等大事。

1948年2、3月间,陈云代东北局起草了《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并在1948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另一篇《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后来入选《陈云文选》。

锦州、沈阳、平津的命运,在陈云心中一直难忘。他曾笑着对部下说过,“平津战役前后,每天使用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火车皮。”1949年1月5日,陈云出席了沈阳工人代表大会,赞扬了“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并号召职工“团结一致,搞好生产,忍受暂时困难,支援前线,彻底消灭反动派,建设幸福的未来。”

1949年2月4日,陈云乘坐由毛泽东号机车牵引的列车到达北京,向党中央当面汇报工作,中旬再次回到沈阳,领导东北财政经济工作,制定东北经济发展计划。源于此,1949年2月2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陈云自己没时间“享受幸福”,但此时的幸福二字,不仅是沈阳人听到的最新鲜的名词,更是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宁和美好。

1949年3、4月,44岁的陈云坐着用两匹马在路轨两旁牵引着前进的“轻型敞篷车”去一家铜矿做调查时还饶有风趣地大声笑着说:“我坐上火车了!”兼任过东北铁路管理局局长的陈云,深知铁路对现代战争、支援前线及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他经常询问与督促铁路修复与运行情况,并亲自起草给党中央的电报,除说明铁路对东北解放战争及工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外,建议中央设立铁道部,筹划与管理铁路事宜。

1949年5月,沈阳军管会的工作结束。陈云遵照党中央决定,离开东北,到中央领导全国财经工作。陈云1945年到1949年的5年时间,参与领导的东北最初经济建设的全过程、业绩,已永载史册。

趋势



资源型城市转型: 东北振兴关键

高敬 杨迪

近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高层研讨会上表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有三个基本的体制亟待理顺,即产权制度、监管制度和价格制度。这一论述与东北现状的结合,可以探索出一些渐次清晰的路径。

去年,中国首次出台了关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首次界定了262个“资源型城市”,他们将作为维护能源资源安全的保障、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战场。

规划显示,目前我国有67个城市由于自然资源趋于枯竭,经济发展滞后、民生问题突出、生态环境压力大,被列为衰退型城市。其中24个地级市中有10个在东北。

两个煤城的“星星之火”

在煤炭产业独大的煤城七台河市,电子商务产业逐渐显露头角,虽仍是“星星之火”,但已露出了“燎原之势”。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和很多“因煤而生、缘煤而兴”的煤城一样,这个资源枯竭城市也因煤炭形势不好,经济一度急转直下。

在这样一座人口百万的煤城,近期却和电子商务产业“亲密接触”,全市兴起网络创业热。给别人打过工,自己也卖过服装,经历过多次创业失败的吕明刚就是其中的代表。

七台河在淘宝、京东、一号店以及自建电商平台注册开展电子商务的企业和个人已达400多户,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创业1500多人。入驻七台河市经济开发区电商产业园的卖家熊传磊说,产业园免费提供经营场所,网络运营商还帮助做产品推广,短时间就聚集了南方3000多客户粉丝。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吉林省辽源市陷入资源危困、经济危机之中。这座130万人口的“煤城”,下岗职工14.7万人,登记失业率20%,城市低保人口占全市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经济最低谷时,整个城市几乎陷入瘫痪!”辽源市委书记吴兰追溯往事,像在讲述一个遥远的噩梦。

十多年过去了,一个“政府聚焦绘蓝图、民营经济唱主角、市场基因被激活”的发展轨迹,凸显着这座资源型城市的坚守与突围。“过去占经济总量70%的煤炭工业,现在占比还不到7%,登记失业率降到3%左右,城市低保人口下降近60%!”吴兰随口说出一组数字,足以印证辽源市成功转型的“凤凰涅槃”。

“当一任市委书记如果舍不得用五年打基础,奢求任期内新兴产业成为支柱是不现实的。”曾任辽源市委书记的吉林省人大财经委主任赵振起直言,资源型城市转型不能搞“快餐经济”,重速度、轻质量往往会迷失方向。

自去年以来,东北经济持续下行,辽源市一些企业融资陷入困境。“经济下行时期,政府更不能‘挂空挡’,可以通过服务,帮助当地企业低成本快速进入新市场。”辽源市金融办副主任宋立军统计,当地政府集中帮助200多家企业办理房照、消防、土地等相关手续,避免因手续不全造成融资困难。

“去年7月到现在企业融资超过10亿元,政府推动主导产业,帮助企业作担保,开发区没有企业因为资金链中断影响生产。”辽源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刘运佳说。

三个基本的体制亟待理顺

刘尚希表示,根据我国宪法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在实际操作中,我国还尚未形成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产权制度形式,致使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的资源利益分割没有制度规范。而产权与行政管理权长期区分不清,也导致资源的无序、过度开发,这是形成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重要制度性原因。

产权不明晰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责任主体不明。刘尚希说,地方政府在没有得到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以国家所有的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资本,实际很大程度上把大部分利益让渡给了企业,而将风险留给了地方、留给了社会。企业作为经济主体,获得收益,但是企业的责任和风险却不明确。比如矿山开采,产生大量外部性成本,最后却要由中央政府来治理。

“资源的开发需要监管,这背后就是规制权。”刘尚希说,资源是否该开采、如何开采、开采到什么程度,都是监管制度中需要考虑的。尤其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或涉及国家战略的资源产品,需要进行规划。他说,监管制度不完善不仅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或经济问题,还会使一些人借机将国家资源转化为个人财富,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

同时,刘尚希指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市场应起决定性作用,但实际上很多资源开采的成本未被市场计入价格中去,例如对环境生态的负面影响,可能多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因此,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在市场上完整显现就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征收资源税。

刘尚希表示,资源税通过税收的方式,使得外部成本内部化,减少生态风险的累积。

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很多,新一轮振兴发展必须把经济转型放在首要位置。

经过多年积蓄发展,全国第一个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阜新市迎来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新机遇。

如今,《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中已明确,要“实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攻坚行动计划”。

在一些资源型城市的代表委员看来,这些含金量高、对资源型城市发展针对性非常强的支持政策,未来一段时期将会释放出政策效应,为加快转型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新华社)